

读史札记

清代藏史杂考三则

周伟洲

一、乾隆时巴勒布商人在藏贸易人数考

清朝乾隆年间，在西藏地方贸易的外商中，人数最多的是邻近西藏边界的廓尔喀和克什米尔商人。廓尔喀，公元1769年廓尔喀人普拉特维·拉纳阳·沙阿推翻今尼泊尔加德满都河谷三个尼瓦尔土邦后建立的王朝名；藏文作“bal po”，译称“巴勒布”，也称“gorsha”，译作“廓尔喀”，也即今尼泊尔。早从7世纪以来，古代尼泊尔（唐代史籍称为“尼婆罗”）与吐蕃就有密切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交往。到清初，这种交往更为密切，比如当时西藏地方通行的货币，就是由尼泊尔各土邦所铸。因此，廓尔喀（即巴勒布，下均用“巴勒布”名）到西藏拉萨等地贸易者甚众。

近代以来，研究清代西藏商业或其与尼泊尔贸易的学者，都引用大约修纂于清乾隆末嘉庆初的《卫藏通志》^①，该书卷十一贸易条内记“所有福康安等先后奏到贸易事宜各条，一并核议。据称，查明在藏贸易巴勒布商民四十名、商头三名，克什米尔商民一百九十七名、商头三名，向俱任其常川兴贩，往来不绝。”^②内记巴勒布在藏贸易商民，仅四十名，商头三人，而克什米尔商民却有一百九十七名，商头也是三名，这是疑点之一。其次，根据其他相关资料，乾隆时巴勒布在藏贸易人数

比克什米尔商民多，此却记人数反而少，而且少得很多。克什米尔远在西藏之西，而巴勒布紧邻西藏聂拉木、济咙，自然与藏传统贸易和贸易人数，较克什米尔更为兴盛和人数为多。此为疑点之二。因此，颇疑上述《卫藏通志》所记巴勒布商民人数有误。

查上引《卫藏通志》一段，是引自“福康安等先后奏到贸易事宜各条”，只有查到福康安原奏，才能解此疑问。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中，有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十月二十三日福康安等“为详察西藏贸易情形立法稽查”一折，内云“窃查西藏地方贸易商民，巴勒布及克什米尔回人居住年久，多有在藏生长者，营运货物，系差店伙往来……查在藏贸易巴勒布商民四百三十名，商头三名，克什米尔商民一百九十七名，商头三名，向俱任其常川兴贩，往来不绝。”^③由此，方知《卫藏通志》撰者在引用上述福康安等奏折中，将“巴勒布商民四百三十名”，漏录“百三”二字，遂讹成了“巴勒布商民四十名”，以后则以讹传讹。^④此后，再版《卫藏通志》时，此处应校勘、加注，并更正之。

二、清代青海藏区“番例”考

番例，又称“夷律”、“夷例”，系清代青海等藏族地区（主要是牧区）通行的法律条例，共六十八条。关于此律例的来源及制定、颁布施行情况，1919年周希武撰《玉树调查

【收稿日期】2011-06-20

【作者简介】周伟洲（1940—），男，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；西安710062

记》一书中，有记述“前清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，颁给唐古忒字律例于西番（指甘青等地藏族），系西宁夷情衙门从蒙古例内，摘出繙译者。例目共六十八条”。^⑤此事在清代文献中，也有记载，撰于乾隆末嘉庆初的《卫藏通志》卷十五部落“三十九族”下有“雍正十二年，颁给唐古忒字（即藏文）律例，系西宁夷情衙门从蒙古例内摘出翻译者”。上述周希武所说，是有依据，是正确的。

也就是说，“番例”是在雍正十二年，由西宁办事大臣衙门（即上述“西宁夷情衙门”）从当时居于青海的蒙古部落的律例中，摘出有关条文，译为藏文后，颁行于青海等藏区。因自明朝正德年后，蒙古一些部落相继迁入青海游牧。自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，入居青海的西蒙古固始汗与西藏第五世达赖喇嘛建立联合的政权，甘青及喀木（康区）的广大藏区均为西蒙古固始汗所统治，推行统一的政令，蒙古律例也通行于上述藏区。直到清雍正二年（1724），清朝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后，甘青、喀木藏区才归清朝直接统治。甘青藏区在蒙古统治下前后约八十余年，均施行蒙古律例。因而，在雍正十二年，青海办事大臣衙门，即从蒙古律例择其有关部分，译为藏文，共约六十八条，颁布施行。

又据周希武《玉树调查记》卷上政治条引清档案记：

嘉庆十四年，西宁办事大臣文（孚）奏云“细查青海蒙古、番子，大约重财轻命，习尚相同。向来命盗等案，一经罚服，两造欣然完结，即深仇夙怨，亦皆冰解。若按律惩办，不特犯事之家，仇隙相寻，即被害之家，亦以不得罚服，心怀缺望。此种积习，不可化诲。优查番子内附之始，雍正十一年间，经大学士鄂（费）等会议，令西宁办事大臣达鼐于蒙古例内，选择关系番民易犯条款，纂成番例，颁发遵行。声明俟五年后，再照内地律例办理。乾隆元、五年、八年、十年，节经奏请展限。嗣准刑部议覆‘番民鄙处要荒，各因其俗，于一切律例，素不通晓，未便全以内地法绳之，不若以番制番，竟于夷情妥协。嗣后自相戕杀命盗等案，仍

照番例罚服完结，毋庸再请展限。’等因具奏。奉旨依议，钦遵在案。伏思番民等如敢纠约多人，肆出劫掠，或竟扰及内地边氓，情同叛逆；以及肆意掳劫蒙古牲畜，凶恶显著，关系边疆大局之案，自应摄以兵威，严拿首从，随时奏明，请旨办理，以彰国典。其止于自相戕杀及偷盗等案，该蒙古、番子等，向系罚服完结，相安已久，一旦绳以内地法律，恐愚昧野番，群滋疑惧，转非抚辑边夷之意。可否俯顺夷情，仍照旧例，出自皇上天恩！”云云。部议具奏“应如所奏办理”。奉旨依议。

以上所述，更为明确地说明嘉庆前后，乃至清末，清廷之所以仍施行“番例”于甘青等藏区的根本原因；但对于蒙古、番子“有犯情重大之案，自应严示惩创”，不得沿用“番例”。内一再提到的“罚服”之例，即“番例”中规定所罚牲畜，原系蒙古法制。“番例”六十八条中有一条“凡罚服一九之数：马二匹，犏牛二条，乳牛二条，三岁牛二条，二岁牛一条。五件之数：犏牛一条，乳牛一条，三岁牛一条，二岁牛二条。至追取罚服之人向犯人取三岁牛一条等语，查番地产马甚少，如罚服内应取马匹者，准改给犏牛。”即是罚服一九、二九以至到九九，二九即两个一九，大小牲畜十八头口，以下类推。

清朝颁布此番例六十八条，因系青海办事大臣所为，自然其通行的地区为青海办事大臣所辖之青海、蒙古各部落（牧区），包括以后又兼管的循化、贵德各番族。据曹抡彬、曹抡翰修纂的《雅州府志》卷十三“夷律”所记，此“夷律”即上述番例，内云“雅属羌戎，另行私律”。即是说，清雅州所属之藏区各土司未实行此“夷律”，而是“另行私律”；雅州西北紧邻甘青之松潘厅各营所辖藏族土司之地，也行此“夷律”。因此而知，“番例（夷律）”施行地区主要是甘青藏族牧区和四川西北藏区。

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“番例”六十八条全文有二种汉译本：一是上述乾隆年间修纂的《雅州府志》卷十三“夷律”，二是上述民国时周希武撰《玉树调查记》一书附录一“番

例”六十八条。两相对照，内容基本相同，主要是因从蒙古文翻成藏文过程中用词、叙事的方式不同，偶有几条内容有歧义。如前者在条例中所说“上等”、“中等”、“下等”人罚服不同；后者则分别译成“千户”、“百户”、“百长”等。又如前者有“有上等人犯盗，罚九五东西，中等罚四九东西，下等罚三九东西。若明知是伊盗窃，故为巧骗者，令伊亲子侄凭人发咒，免议”一条。后者此条译作“千户等隐匿盗贼，罚五九；百户等行窃，罚五（四）九，隐匿盗贼罚四九，管束部落之百长等行窃罚三九，隐匿盗贼罚二九牲畜。若隐匿盗贼及行窃之处，不行承认者，令其伯、叔立誓；无伯、叔，令其伯、叔之子立誓。若头目等本身行窃，革退等级，撤出所管之人，免其抄没其家产、牲畜。”另外，两者有些条目的分、合也不同。

关于“番例”具体执行情况，正如周希武《玉树调查记》所说“按罚服犏牛之法，虽有此制，而西番实未奉行，要之杀人不抵命，则蒙、番均也”。即是说，“番例”之罚服之例，在甘青等藏区中事实不能按例罚服，主要原因可能是甘青藏区藏族牧民较为贫困，牛、马不多，罚服之例重，故很难照例执行。但是，一般杀人不抵命，罚服了事（或赔偿其他财物），则是甘青，甚至四川整个藏区通行的法律。如青海藏区，“西番罚服之例，照被杀之身分，以为赔偿之差。重者偿百金，轻者半之，折交茶包之类，外给马一匹，鸟枪一，刀一而已。或曰，轻者罚茶八十包，约值银三百两；重者罚出经卷一百八帙，约值银六百两；最重罚出经卷及他物，值银千两以上。真不能偿者，由本村之人担任。甲村之人负乙村之人债务，甲村亦有摊赔之责。”^⑥

三、《巴塘善后章程》考

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建昌道赵尔丰与四川提督马维骥率军“剿办”巴塘，以解决“巴塘事件”。六月，赵尔丰等克复巴塘、理塘。三十二年七月，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，其走马上任后，首于巴塘、理塘实行“改土归流”，从而拉开了清末川边大规模

改土归流之序幕。

在现存的有关档案文献中，有一份《巴塘善后章程》，是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重要文献。以后川边所订立的改土归流的章程，如宣统元年四月十八日的《乡城改革章程》、同年六月二十九日的《察木多改革章程》、同年十二月的《科麦地方章程》、宣统三年二月的《德格、春科、高日三土司设置章程》等，均沿袭《巴塘善后章程》的“改流”精神和原则，对研究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最早正式刊行此《章程》全文的是吴丰培先生编的《赵尔丰川边奏牍》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），其名为《改土归流章程》，共分四十三条，附百家姓；可惜未记此《章程》颁布之时间。此后，张羽新编著《清朝治藏典章研究》下（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），收录吴书此《章程》，未注明出处，且在标题下注明“宣统元年（1909）二月”。此可能系作者见吴书此《章程》后有《通饬整顿兵差并定乌拉章程》系于“宣统元年三月十五日”，故将上《章程》厘定于此年二月。

事实上，早在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川民族研究所编《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》一书，已收录上述《章程》，其名为《巴塘善后章程》，时间为“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”，编者所加标题为《锡良（川督）咨请赵尔丰查收转发〈巴塘善后章程〉汉文本》。后注引自《边务档案资料》第一分册，据此书《编辑说明》，《边务档案资料》，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《清末赵尔丰边务档案资料》的简称，系原藏于四川民族研究所的手抄本，未正式公开出版。在《章程》前有一段文字：

案查贵大臣（赵尔丰）拟定《巴塘善后章程》，前经饬印藏文□千本转发在案。兹又饬印汉文四千本，请查收转发。相应咨请查照施行。计汉字《巴塘善后章程》四千本。

以下即《章程》全文，其内容与文字，几乎全与吴书所编录的《改土归流章程》相同。不同之处有：

(1) 吴书《章程》将各条编号，共四十三条；而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录的《章程》（下简称“川书”）则未编号，保存清代档案文献的体例，均用“一、”的形式。

(2) 个别字句及标点不同：如吴书“(一) 改革：巴、理两塘，正副土司业经正法，从此永革土司之职……”川书此条为“一、改革 巴塘大、二土司业经正法，从此永革土司之职（下同）”；吴书“三、裁撤土司：从前所设……”川书作“一、裁撤 土司从前所设（下同）”；吴书“(九) 僧粮：凡在巴、理塘全境喇嘛寺院……”川书作“一、僧粮 凡在巴塘全境喇嘛寺院……”；吴书“(十一) 纳粮：……”川书作“一、纳银……”；吴书“(十八) 命案：……其中或有情节轻重之间，听官审断……”川书作“一、命案……其中或有情节不同，轻重之间，听官审断……”；吴书“(二十二) 常案：……如无理者过于狡诈，即予杖责重惩”，川书作“一、常案……如无理者，过于狡诈，即予杖责示惩”；吴书“(二十四) 原告：控案被告必待传而后到……”川书作“一、传票 原告控案，被告必待传而后到……”；吴书“(三十五) 净面：……若终日囚首垢面，不知辜负此生为人，须改此习”，川书作“一、净面……若终日囚首垢面，不免辜负此生为人也”；吴书“(三十六) 冠服：地方既经改革……”川书作“一、冠服 巴塘既经改革……”；吴书在“(三十七) 着裤条后，列“三十八条平等”至“(四十二) 中厕”条，最后列“(四十三) 辨族”并附百家姓，而川书则将“一、辨族”条及附巴塘百家姓，置于“一、着裤”条后，最后为“一、中厕”条。

(3) 两书所录之“附百家姓”名称及个别字句不同。吴书作“附百家姓”，川书作“附巴塘百家姓”。现录吴书“附百家姓”，并附川书所录之异同：

巴康于古初，黄苗汤沐国，张梁夏商周，游牧司广泽（川书“司”作“习”）。通贡盛汉京，班范纪陈籍，唐宋及元明，沙门满戎狄。宁边劳王师，高□振金石（川书阙字为“张”字，“振”字为“寿”字），武侯管乐曹，文翁经史席。了钱别甘辛（川书“了”作“丁”，“甘”作“甘”），莲蔴区黑白（川书“莲”作“篷”），胡服习牛马（川书“习”作“易”），风雷凌松柏。吴楚晋诸姬，安危计万叶，岳公盖代双，平城贺魏阙。

对照上述两书所记之《章程》，显然四川民族研究所编《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》所辑的《巴塘善后章程》，更接近于原始文件。因此，此《章程》应名为《巴塘善后章程》，因章程仅只涉及巴塘地区改土归流的各个方面，而非整个川边或巴、理塘之《改土归流章程》；但其内容包括之广，规定之细致，确代表了川边改土归流之原则和精神。

其次，此《章程》颁发的时间，自然应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平定巴、理塘之后不久颁发施行的，即应如《清末川滇边务档案》所记，为“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”，而非迟至“宣统元年二月”。

最后，在引用或理解《巴塘善后章程》时，应以《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》一书所录《章程》为准，适当参考吴书所录《章程》，方不致有大误。

①关于《卫藏通志》的修纂者，过去有驻藏大臣和琳、松筠诸说，今人张羽新撰文考证，此书撰者为和宁；见张羽新《〈卫藏通志〉的著者是和宁》，载《西藏研究》1985年4期。

②引用此段巴勒布商民人数者，如《西藏的商业与手工业调查研究》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，第34页。

③此奏折见《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》(3)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777—779页。

④仅见苏发祥《清代治藏政策研究》（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）第151页注中，指出上述《卫藏通志》巴勒布商民人数错误，云为“笔误”，未加考证。

⑤⑥周希武撰，吴均校释《玉树调查记》卷上，政治，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70页；第71页。